

开拓世界史新视野的第一创举

——吴于廑教授对世界史学科建设的贡献

庞 卓 恒

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开始在我国物质生产的田野润拂出绚丽的花朵和丰硕的果实。但是,在精神生产领域,却远说不上已经繁花盛开,真正具有生命活力的花蕾,大都还只是在萌动之中。

正当此时,1982年10月,吴于廑教授发表了《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①;接着,1984年初,又发表了作为前文姊妹篇的《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②。10年后的今天,再回头来看这两篇文章对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的意义,我们有充分的根据说,那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在我国开拓世界史新视野的第一创举。

在此以前,我国的世界史编纂体系受到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然而却是马克思本人明确反对的——“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③的严重束缚。按照那种理论,全世界各民族都“必然”要依次经过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这样几个“必经阶段”,然后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如果有谁越过了其中某个阶段,那也不过是较之“普遍规律”有所“变异”的“特殊现象”。这种理论主宰下编写的世界通史,就成了那个“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的图解或例证汇编。前苏联科学院主编的10卷本《世界通史》就是这种编纂体系的一个突出样本。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的世界史著述深受这个样本的影响和束缚。世界史著述的主要目光集中于如何在世界范围内证明五种生产方式依次更迭及其分期;在论述生产方式时,主要萦注于判定它是奴隶制、封建制或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证明历史发展“规律”和原始社会以后的“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的真理,而不是象马克思那样把生产方式当作“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④或“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⑤去论证。这样的世界史著述当然就会失去世界历史自身绚丽多姿的血肉风彩,也越来越缺乏启迪人们历史智慧的感染力和感召力。但是,如果有谁敢于对此提出异议,就有可能被责为离经叛道。

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吴于廑教授鲜明地提出,有必要对世界历史作“新的再认识”。他从马克思关于世界史有一个从分散到整体的形成过程的提示中展开他的思考,以学贯中西的专业历史学家的深厚功底和历史思想家的恢弘胸怀,去追溯世界史的形成过程。他勇敢地撇开奴隶制或封建制的生产方式的机械分期这个“主线”(实际上并未忽略对社会性质和阶级关系的分析),径直从上古直到15世纪存在着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划分及其相互冲突这个客观事实作为分析的着眼点。这在当时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一些同行中,难免引起惊诧。但惊诧之后仔细思量,就发现吴于廑教授确有充分的依据。马克思恩格斯曾论及畜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由于谋取生活资料的方式不同,决定了它们具有不同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以畜牧民族为例(纯

粹的渔猎民族还处于真正发展的起点之外)。在他们中间出现一定形式的,即偶然的耕作。土地所有制由此决定了。它是公有的,这种形式依这些民族保持传统的多少而或多或少地遗留下来,斯拉夫人中的公社所有制就是个例子。在从事定居耕作——这种定居已是一大进步——的民族那里,象在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⑧,耕作居于支配地位,那里连工业、工业的组织以及工业相应的所有制形式都多少带着土地所有制的性质”^⑨。吴于廑教授也正是从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具体差异中分析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矛盾冲突及其对相互联系的世界史形成过程的影响。他在具体分析中,对游牧民族的战争生活以及战车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予以特别的关注,这也表现出他对唯物史观丰厚内涵的把握深度。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对野蛮的征服者民族说来,正如以上所指出的,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在传统的、对该民族来说唯一可能的原始生产方式下,人口的增长需要有愈来愈多的生产资料,因而这种形式也就被愈来愈广泛地利用着”^⑩。吴于廑教授把这样的观点运用来具体分析上古中古时期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的冲突及其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把一个长期被忽视了的历史图景展现在人们面前,这就有助于启发人们辩证地而不是教条式地认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他对游牧世界向农耕世界发起的三次大冲击的历史后果的分析,尤为发人深思。他指出:“前面所考察的发动和卷入三大冲击浪潮的游牧世界的各部族,基本上都逐渐溶入农耕世界,成为农耕世界历史发展中的新因素,使农耕世界的范围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显示它在经济文化上相对于游牧民族的优势。蒙古人建立的大帝国,在客观上促进了亚欧大陆东西之间的陆上交通。阿拉伯人的帝国除发展了亚欧两大洲之间的陆上交通而外,还发展了连接红海、印度洋、西太平洋的海上交通。大食商人在我国唐代东南地区的活动是大家熟知的。所有这一切,都有利于在某种程度上打破各民族间的闭关自守,在历史发展为世界史的进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⑪吴于廑教授并未忽视大冲击带来的严重破坏。肯定其客观上的某些积极作用,只是肯定历史的辩证发展的过程。我们承认,在人类还没有完全脱离动物界的时代,往往“只有用人头作酒杯”^⑫,才能喝到历史进步的甜美酒浆。我们承认这个事实,并不等于承认那是人类永远摆脱不了的“永恒真理”,恰恰是为了证明人类应该而且必然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最终脱离那样的时代,从而启迪人们自觉地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迎接人类最终脱离动物界的时代的到来。

在论证了游牧世界经过对农耕世界的三大冲击浪潮而逐渐溶入农耕世界的历史进程以后,吴于廑教授接着追踪世界历史的下一个历史进程,从农本向重商的转变进程。他首先以大量史实证明,在上古中古的漫长时期,无论东方西方的农业社会,都是以农为本的,占统治地位的观念都是重农抑商的。那些富有说服力的论证,对于澄清所谓“中国自古抑商、西方自古重商”之类的模糊认识,至今还具有启发意义。

那么,由农本转向重商的初始动因是什么呢?这一转变为什么首先发生在亚欧大陆的西端呢?这是在探讨这一过程时不能回避的两个老大难问题。对此,吴于廑教授都作了精辟回答。

对于什么是从农本转变为重商的初始动因的问题,吴于廑教授否定了某些西方学者强调外来的商业刺激作用的外因论,指出初始动因来自于农本经济的内部。他根据马克思关于西欧农奴制下农奴经济的生产可变量增长的可能性的提示,深入探寻由农本向重商转变的初始动因。他指出:“只要农民有出售多余生产品的可能和为交换他不能生产的物品而有出售自己生产品的必要,他就会扩大这个生产可变量,就有可能导致新的经济发展,包括商业、市场、市集以至城市的兴起。”^⑬这些分析是十分精辟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单是维持农奴存在的必要性和大经济的不可能性(它要求把小块土地分给农奴),很快就使农奴对封建主的赋役降低到中等水平的代役租和徭役地租,这样就使农奴有可能积累一些动产,

便于从他的领主那里逃跑出来,并使他有可能去当市民,同时还引起了农奴的分化。可见逃亡农奴已经是半资产者了。”^⑧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进一步指出:“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⑨在《哲学的贫困》和《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也阐述了同样的观点。我自己在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中对此作了一些论证,但至今也还谈不上很充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著名的西方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证实马克思的观点确有历史依据^⑩。

吴于廑教授在这方面的研究,较之已有的成果,从一个新角度——也就是从西欧农本经济中耕织两方面具体内容的特点及其相互比重的变化的角度——向前推进了一步。他指出:“由于耕和织两个方面的需要,再加传统肉食习惯的需要,畜牧,主要是牛羊饲养,在封建欧洲的农本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一特点遍及欧洲,虽则也存在着地方差异。15、16世纪以前,当欧洲封建农本经济发展滞缓之时,这只是耕织结合自足经济的常态,看不出是特点,也看不出有什么潜在意义。但是,一旦商业和城市经济的媒体在农本经济中扩大它的触及面,这个与毛纺织业密切相关的牲畜饲养,就会因其比重之大,从常态中突出起来,在商业和城市经济转化为封建农本经济的对立物并使之发生根本变化的过程之中,起突出作用。”^⑪吴于廑教授以大量的史实和数据对这一论点作了令人信服的证明,由此也就从一个新的角度回答了农本向重商的转变为何首先发生在亚欧大陆西端这个问题。人们可能会以阿拉伯人和斯拉夫人的农本经济中可观的畜牧比重为据,来证明那不能说是西端先行的唯一原因或首要原因,但绝无理由否认那是一个重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众多西方学者近年来从事的“农村工业化”或“原始工业化”、“工业化前的工业化”(Rural Industriliazation 或 Proto-industriliazation, Industriliazation Before industriliazation)方面的大量研究成果也表明,吴于廑教授的上述论点是经得住史实验证的。

10年后的今天,再来看吴于廑教授提出的这些论证对于开拓世界史新视野和促进世界史学科建设的意义,就看得更清楚一些了。如今,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观和编史体系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自然,不少同行们还在从另外一些角度进行着有意义的探索,但也许大家都会承认,促进这方面的探索的第一次有力的启动,来自吴于廑教授。还需指出的是,吴于廑教授提出的世界史的观测和编史体系,在国际史坛也已产生了一定影响。丹麦学者李来福(Leif Littrup)在欧洲学术刊物上多次发表文章,介绍吴于廑教授的主张及其影响。事实上,我们的欧美同行如果把吴于廑教授提出的世界史观和编史体系与《剑桥世界史》、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和斯塔弗里阿诺斯“环球通史”体系等等相比较,都不难发现前者独有的新意。可以说,它也是我国的世界史学科正在走向世界的标志之一。

最后我还想着重说的一点是,吴于廑教授在开拓世界史新视野方面的贡献,还不只限于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论点。在我看来,尤为宝贵的是他对唯物史观丰厚内涵的发掘和生动具体的运用。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唯物史观往往被误解为马克思本人明确反对的“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甚至被当作“普罗克拉斯提之床”(Procrustean Bed),一切与它的尺码规格不相符合的历史现象和过程,都要按照它的规范来加以裁削或抻张。这样作的结果,不但使历史真相遭到扭曲,历史著述成为失去血肉丰彩的干瘪骷髅,更严重的是,败坏了唯物史观的科学形象,致使一些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产生对它的逆反心理。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一贯反对诸如此类的作法。早在他们首次系统地提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及其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时,他们就指出:“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

而代之以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间的连贯性。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的还是有关现代的)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这些困难的克服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根本是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是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得出的。”^⑨吴于廑教授对唯物史观的运用,正是遵循了这样的原则,诸如他对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生产生活过程的差异的分析,对战车在游牧世界生活过程中的作用的分析,对西欧农奴生产自变量的分析,对欧洲人的衣食习惯及其与牲畜饲养业在西欧农本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的关系的分析,对牲畜饲养业在西欧从农本向重商转变过程中的突出作用的分析……等等,都具体地体现了“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得出研究的前提的科学态度。这样,唯物史观在吴于廑教授那里,就再也不是束缚创造性思维的普罗克拉斯提之床,而是帮助他张开创造性思维的风帆畅游史海的得心应手的指南针。吴于廑教授对待唯物史观的科学态度,也是我们应该认真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

注 释:

- ① 该文原是吴于廑教授在参加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学术年会期间,应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邀请所作的学术报告,后由《云南社会科学》全文发表于该刊1983年第1期,《世界历史》1983年第1期发表了该文详细摘要。
- ② 该文发表于《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
-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页。
- ④⑦⑩⑪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109—110、75、75页。
- ⑤⑧⑫⑬⑭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27、85、252、31—32页。
- ⑥ 马克思著作中所称的“古代社会”指的是“古典古代社会(是特指的 Antique Society 而不是泛指的古 Ancient Society),即古希腊罗马社会,而且并不笼统地称之为奴隶制社会,只是指出在其后期古典奴隶制占了统治地位,他们所称的“封建社会”也主要是指西欧那种“拉丁——日耳曼封建制”社会。马克思并不认为东方存在过那样的社会形式。他的早期和晚期著作中都持这样的看法。这也是他一贯反对把唯物史观曲解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的明证。
- ⑨ 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载《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 ⑩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陶尼(R·H·Tawney)和希尔顿(R·H·Hilton)的著作特别值得注意。
- ⑪ 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

(本文责任编辑 吴友法)